

烟台故事

双莲并蒂 经史和鸣

——郝懿行与王照圆的学术姻缘

孙明浩



在乾嘉学术的星空中，郝懿行与王照圆是独一无二的“并蒂”双星。他们的结合，超越了“红袖添香”的传统图景，缔造了一种“如师如友”、在经史考据中灵魂共振的学术姻缘。丈夫郝懿行，是《尔雅义疏》的作者，一代朴学大家；妻子王照圆，则是《列女传补注》的撰者，被誉为“一代女宗”。时人将“高邮王父子”（王念孙、王引之）的“家学”与“栖霞郝夫妇”的“家学”并称，传为“夫妇著述，一家两先生”的佳话。他们的生命与学问彼此缠绕、相互滋养，如同一枝根脉相连的并蒂莲，在清代学术史上留下了不可复制的芬芳印记，也为后世树立了志同道合、彼此成就的婚姻典范。

红烛诗盟

乾隆五十二年（1787）冬，栖霞郝家的红烛从院门一直燃到第四排房的窗下。三十岁的郝懿行身着吉服，望着轿中缓缓走出的新妇王照圆，眼中的拘谨与期待交织——这位福山才女的名声，他早从友人的诗稿中得知，却未料得此生竟能与之结为连理。

宴席散后，闹洞房的亲友渐次离去，宅院归于沉寂，唯有窗棂外几双好奇的眼睛，屏息等待着才子佳人的私语。红烛的光晕在描金的妆镜上流转，王照圆忽然开口：“以诗为戏，限酒热诗成，如何？”郝懿行欣然允诺。他提笔而就的《却扇诗》里，“二十五年谐凤卜，八千余里壮鹏图”是对过往等待的剖白，“切莫低声唤老奴”又藏着几分少年意气的诙谐；王照圆回以“挑灯最喜亲风雅，先说周南第一篇”，既显经学素养，又暗

合新婚的温婉。那夜的诗兴如烛火跳跃，《催妆》《关关雎鸠》《河鲤登龙门》，一首接一首的唱和，让窗外听壁脚的人忘了时间。直到东方泛起鱼肚白，人们才惊觉这对新人竟以诗为媒，把洞房变成了风雅的书斋。

五日后，郝懿行将这些新婚对诗辑成《和鸣集》，王照圆为集子作记时，那句“聊无鸾随凤鸣之意，观者其消余耶”，看似自谦，实则藏不住夫妻二人精神相契的默契。彼时谁也未曾想到，这册薄薄的诗集，不过是他们四十年学术姻缘的开篇。

婚后次年，郝懿行赴济南乡试，王照圆作《戊申秋试寄兰皋》相赠：“如君折得蟾宫桂，自尔高山听鹿鸣。”诗中的期许并非空泛的勉励——她深知丈夫“漏下四鼓治经”的勤勉，更懂他“储风

毛，卜夏昌”的志向。果然，郝懿行不负所望，一举中举。嘉庆四年（1799）春，他再赴京城科考，高中进士的捷报传回家乡时，郝家院中那缸被他视若珍宝的荷花，竟开出了一枝并蒂莲。

在北方的庭院里，并蒂莲是罕见之物，消息传开后，乡邻争相来看。王照圆将这奇景写入家书，远在京城的郝懿行读信后，提笔写下《双莲华记》。文中他并未沉溺于“科名佳兆”的附会，反而冷静写道：“妖祥二端都不相与耳”，唯有“君子修身，不改其度”才是根本。但这枝并蒂莲，终究成了他们婚姻与学术的象征——父亲郝培元请画师杨受廷作《并蒂莲》图，题诗“双莲室，足徜徉”；后来郝懿行遵父遗愿，将故居书房命名为“双莲书屋”。

琴瑟和鸣

郝懿行与王照圆的婚姻，最动人的并非“才子配佳人”的浪漫，而是“志同道合”的笃定。他们是生活中的伴侣，更是学术上的同路人，彼此的成就，都离不开对方的滋养与支撑。

郝懿行的学术道路，从一开始就带着“不为仕途为经史”的底色。他自幼嗜学，“五日不读书，筋力欲衰老；十日不作文，心思已枯槁”的《励志》诗，道尽了他对治学的执着。中进士后，他被授户部主事，却始终“不挂心仕途”，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《尔雅义疏》《山海经笺疏》等著作的撰写中。这部耗尽他半生心血的《尔雅义疏》，被誉为“清代《尔雅》研究的集大成之作”，而书中多处引“照圆说”的标记，正是夫妻二人学术合作的明证。

闺中硕学

王照圆的学术根基，早在幼年便已扎下。

她出身福山古现王氏家族，这个先后走出王懿、王检等封疆大吏，以及王懿荣等金石学家的文化世家，赋予她的不仅是门第的荣光，更是“幼秉家学”的熏陶。六岁丧父后，母亲林氏以“栖霞望族”的教养，教她读《孝经》《内则》，十岁那年秋夜，她与女伴戏于月下，随口吟出“海上一轮月，乾坤通彻明”，便已显露出过人的才情。十二岁学《毛诗》，“常至夜分”仍不肯释卷；十五岁读经史，二十岁便开

据张澍记载，他曾登门拜访郝懿行，席间王照圆“以《尔雅》疑事来发问”，他竟“勉强酬答而已”。这细节足以说明，王照圆并非简单的抄录者，而是郝懿行学术上的“诤友”——她对《尔雅》的理解，甚至能难倒来访的学者。郝懿行自己也坦言，治经之难，在于“参正异同得失”。而王照圆的质疑与补充，常常能让他“偶然窥新境，郎若睹清昊”。这种平等的学术对话，在男尊女卑的传统社会里，尤为难得。

在京都寓居的岁月里，王照圆凭借深厚的学养，与阮元、臧庸、王念孙等学者往来论学，备受尊重。阮元将自己的书斋由“续古斋”改为“积古斋”，便源自她题诗中的“斋名积古从公定”；臧庸为《列女传补注》作序时，更

始撰写《葩经小记》——在那个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时代，她的成长轨迹，本身就是对世俗偏见的反叛。

嫁给郝懿行后，王照圆的学术视野得以进一步拓展。她不再是独自钻研的闺阁才女，而是有了可以“互问互答”的学术知己。夫妻二人合著的《诗问》七卷、《诗说》二卷，便是这种合作的结晶。王照圆解《诗》，最难得的是兼具考据的严谨与女性的敏锐，她既会引《说文解字》佐证字词本义，又能从“知我如此，不如无生”中读出饥民的绝望，她的注语让冰冷的经文有了温度。

是将她与郝懿行并称为“一家两先生”，与高邮王念孙、王引之的“父子著述”相提并论。这种认可，无关性别，只关乎学识。在乾嘉考据学的殿堂里，她以女性学者的身份，赢得了与男性同侪平等对话的资格。

郝懿行因病停写《尔雅义疏》时，是王照圆“时时料检，每以却书静摄为箴”；待丈夫在病中浏览《晋》《宋》诸书，写下札记后，又是她“删落繁芜，斐然成帙”，并为《晋宋书故》作跋，记下“药炉常满，席几凝尘”中的治学不易。李慈铭将这篇跋与李清照为《金石录》作序相比，却道“与李清照是在赘居乱后者不同”——王照圆的坚守，是与丈夫并肩而立的相濡以沫，而非独自面对残破的追忆。

《列女传补注》八卷，是王照圆最具代表性的著作。这部为完成母亲遗愿而作的注本，以曹大家注为基础，“考伪证谬，订异参同”，将虞贞节、纂母邃等各家之说融会贯通，甚至对《列女传》的体例与作者提出了独到见解。她在序言中写道：“不揣愚蒙，略依先师之诂，用达作者之意”，字句间满是对学术的敬畏。而在《列仙传校订》中，她更是大胆质疑“《列仙传》为刘向所撰”的传统说法，指出其“文不与《列女传》同，又《汉艺文志》所不载”，并将后世附加的赞文“别更为篇”，以存古籍原貌。

风雨同舟

嘉庆二十五年（1820），郝懿行的咳嗽声在京都齐鲁会馆里愈发频繁。此时的他已年近六旬，官阶仍是户部主事，俸禄微薄，家中“药炉常满，米缸见底”。王照圆为了给他治病，不得不变卖自己的首饰，可即便如此，郝懿行手中的笔也从未停下——那些关于上古山川、神祇的记载，是他对抗疫病的精神支柱。

郝懿行的仕途，从一开始就注定平淡。他性格耿直，不擅钻营，在户部任职二十七载，始终未得升迁。有人劝他“少营私计”，他却答：“经史足以自娱，何暇顾其他？”这种“不慕荣利”的态度，让他得以避开官场的倾轧，也让家人陷入贫困。王照圆从未有过半句怨言，她将家中的琐事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让郝懿行能“泰然著书立说”。寒冬时节，书屋里没有炭火，她便煮一壶热茶，陪丈夫在灯下校书；粮食不够时，她把家中仅有的米留给丈夫熬粥养病，而且将一日三餐减为两餐。

除了贫困，丧子之痛更让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。

薪火相传

王照圆去世后，郝家的孙辈郝联薇接过了整理遗著的重任。他将郝懿行与王照圆的手稿一一收集、校订，历经艰辛，终于在光绪四年（1878）将其编为《郝氏遗书》刊行。光绪十年（1884），《晒书堂集》付梓，这部收录了郝懿行诗文杂著及王照圆《晒书堂闺中文存》的集子，让这对夫妻学者的文字得以广泛流传。

在郝懿行与王照圆的故乡，人们以自己的方式纪念着他们。福山区古现镇河北村打破“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”的旧例，为王照圆修建了衣冠冢，还在祠堂中设立了专门的祭位。如今，河北村的老人仍能讲起王照圆“月下吟诗”“校书治学”的故事。那些口耳相传的记忆，让双莲精神有了最朴素的传承。

在学术史上，郝懿行与王照圆的影响更为深远。郝懿行的《尔雅义

疏》至今仍是研究《尔雅》的权威著作，王力在《中国语言学史》中称其“训诂精当，考据翔实”；《山海经笺疏》则为后世研究上古地理、神话提供了重要依据。王照圆的《列女传补注》《诗说》等著作，不仅在清代学术界引起轰动，更成为后世女性学术研究的典范。

如今，栖霞双莲书屋的旧址虽已不复存在，但“双莲并蒂”的象征意义却愈发鲜明。它代表着一种超越世俗的爱情——不是“举案齐眉”的恭敬，而是“如师如友”的相知；代表着一种坚守初心的学术精神——不为名利所惑，不为贫病所移，只为“阐明古义，裨益后学”；更代表着一种突破偏见的勇气——王照圆以女性之身跻身乾嘉学派的行列，用学识证明了“女子亦可治经史”。